

西方话语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映射研究

丁志明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外语系, 浙江 杭州 311231)

摘要: 从 2010 年西方媒体话语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 从成本收益维度、心理暗示维度、话语的现实影响维度和话语互文性维度论述西方国家运用媒体话语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决策的进程和潜在动机。通过科学的分析, 寻找影响中国汇率政策的关键性变量, 并据此构建影响中国汇率决策的话语映射函数模型。

关键词: 西方话语; 互文性; 汇率政策; 人民币升值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124 (2012) 01 - 0062 - 04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扩大, 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明显增加, 长期呈现净流入态势, 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2001-2010 年, 资本净流入累计 7030 亿美元, 相当于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 25%。同时, 以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为首的西方学者纷纷开始从学术角度论证人民币升值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如果人民币不升值, 就证明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存在人为操控, 于是西方国家据此挑起贸易大战。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估量。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表面看来的对外贸易中损失的几个就业机会, 或者有多少产业可能受到影响, 这些都是小问题, 并不是本质问题。人民币升值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笔者觉得在很多相关的研究中有相当重要的一点没有被解读出来。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手中持有大量美国债券、金融资产, 美元迫使人民币升值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对中国来说最严重的一个后果, 就是相当于中国国内的储蓄被美国剥夺了, 是国家财富直接受到损失的问题。当人民币升值 10%-20%, 国内损失可能高达数万亿人民币, 也许相当于一年财政总收入, 相当于 GDP 的 10%, 是这个数量级的损失。也就是说, 你的钱变成美元借给美国

之后, 当美国迫使你升值的时候, 意味着你国内的储蓄直接被美国没收了。2003 年-2008 年人民币升值导致外汇储备损失了 5000 亿美元, 相当于 2004 年、2005 年中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相当于 13 亿人民白干了一年, 这个损失是相当惊人的。

西方国家正是用各种媒体话语, 在世界人民的意识中植入人民币升值是历史必然规律, 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的, 从而有意识地迫使人民币升值, 实现西方国家的利益最大化。

二、语言经济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国内外学者开始从经济的视角研究语言问题。

1. 实证经济学视域下的研究。Grin 研究少数族裔使用多数族裔的语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利益;^[1] Vaillancourt (1987)、Chiswick (1991)、Grin (1994)、Dustmann (1994) 在实证经济学的视域下对移民的收入与其外语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2] Holden 在 1987 年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属地的语言政策。^[3] 国内学者如林勇、宋金芳在 2004 年的《语言经济学的政策分析及其借鉴》中, 通过对西方研究者的实证研究案例分析, 论证语言政策的收益和成本, 并且对语言政策的经济分析方法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加以研究评述。宁继鸣博士的《汉语国际

收稿日期: 2011 - 06 - 23

作者简介: 丁志明 (1979-), 男, 浙江杭州人,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语言经济学。E-mail: tonyding007@163.com

推广：孔子学院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内在语言经济学领域第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实证性研究成果。

2. 博弈论视角的研究。Selten and Pool 在 1991 年从博弈论角度对语言行为均衡问题的探讨；塞尔腾等学者从博弈论角度解释语言现象的文献为语言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通过博弈论使得语言的经济分析有可能融合符号交往的社会学、政治学和语言的哲学以及语言的社会交往理论等已有的西方学术传统。^[4] Colomer 在 1996 年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外文翻译工作的比较经济效益。^[5]

3. 纯理论角度的研究。汪丁丁、韦森和周端明等人是从纯理论角度研究语言经济学。这些研究者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人们如何选择自己使用语言以及研究语言的形成，他们的观点是：语言的习得和选择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整个过程受语言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所学语言与母语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开放与自由度、学习语言天赋和使用语言的人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6] 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创建语言经济学分析框架。许其潮、王伯浩、任荣等用成本—收益方法对语言修辞学、网络流行语、外语教学和生活流行语进行研究。黄少安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汉语国际推广问题。

诚然，国内外开始有语言学家从经济学维度研究语言问题，但是人数却寥寥可数。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仅限于很狭窄的范围内，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发展初期。它的应用领域必会随着语言经济学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得到进一步拓展，多样化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必然将被研究者所运用。

三、西方话语对中国汇率政策影响的阐释

（一）西方各媒体的话语分析

2010 年 1 月 11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盟（EU）执委会主席巴罗索，在访华中向中国领导人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西方国家领导人从政治外交的角度要求人民币升值。2010 年 1 月 12 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美国一所著名高校发表演讲中再次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2010 年 1 月 12 日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称，人民币兑其他货币需升值 30%。

从学术规律性的视角阐述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并且提出了具体升值幅度，进而影响人们的升值预期。2010 年 1 月 20 日举办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加拿大财长费海提表示，加拿大已同意日本的请求在 2 月会议上讨论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性。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营造世界舆论氛围逼迫人民币升值。2010 年 2 月 4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美国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人为低估。2010 年 2 月 9 日美国再次向中国施压，要求允许人民币升值。2010 年 3 月中旬美国 130 名议员要求盖特纳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并增收 27.5% 的关税，要求人民币升值。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2010 年 4 月 15 日延期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3 月至 4 月期间，从国际贸易利益的视角，威胁中国政府做出人民币升值的决策。2010 年 4 月 27 日印度央行官员同时呼吁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2010 年 6 月 16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向芬兰《贸易报》表示，为了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必须“尽快”重新确定人民币币值。2010 年 9 月 15 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财政部长盖特纳称人民币低估 40%。2010 年 9 月 27 日迫于国会议员压力，盖特纳承诺将在 G20 首尔峰会上动员各国一同敦促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2010 年 10 月 21 日美国推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拉拢盟友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2010 年 10 月 27 日七国集团（G7）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2010 年 11 月 16 日美国钢铁制造商联盟及其他商业团体提出呼吁，要求参议院在未来数周通过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提案。借用美国企业之口，试图证明促使人民币升值是美国人民的诉求，以掩盖美国银行家们欲从人民币升值中图利的意图。

西方世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攻击的靶子，无疑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再次逼迫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推托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形成、发展以及应对危机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是想以此迫使中国为金融危机埋单。至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及其与“全球经济失衡”的联系，不过是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转嫁责

任的借口。需要指出的是,自中国政府在 2005 年 7 月启动人民币汇改以来,截至 2011 年 8 月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跌破 6.38,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 23%。

(二) 西方话语对中国决策的现实影响

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自 2005 年 7 月 21 日起,中国已经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2005 年 9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扩大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从原来的上下 1.5%扩大到上下 3%。2007 年 5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

2010 年 2 月 3 日,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并且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为美国扩大出口。2 月底,在韩国首尔召开的 G20 集团副部长级会议上,IMF 发布了经济分析报告称,人民币被明显低估。随着同年 6 月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临近,6 月 19 日中国央行宣布“二次汇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持续升值趋势。中国百姓甚至开始认同一些外国的经济专家的话,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人是好事。中国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讨教学习经济发展经验,大部分接受西方国家的判断,潜移默化地接受暗示者的影响。西方话语正是通过这种心理,让中国接受人民币升值是理所当然的必然趋势。

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均会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假如出口商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将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特别是目前我国主要以极易替换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为主,一旦出口受阻,极易发生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从而失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在没有其他政策调整的情况下,相对的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将导致

GDP 增速相对基准下跌,从而进一步抑制消费和一般贸易进口。

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不仅影响企业向海外投资,而且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形成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虚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人民币的实际升值会影响外贸企业的发展,减少就业,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事实上,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估算,2010 年 1 月到 2010 年 12 月的一年时间内,中国面临持续的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入,流入的总规模达到 3328 亿美元,高于全年的净流出。2010 年第一季度流入额达到 582 亿美元,第二季度流入额达到 1279 亿美元,第三季度为 896 亿美元,第四季度为 571 亿美元。月度的流入峰值为 4 月、5 月、9 月,均超过 400 亿美元。月度的流入最低值为 8 月,仅为 57 亿美元。2010 年人民币升值 8%,这些短期国际资本获利高达 266.24 亿美元。同时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持有者,因人民币升值而产生的实际损失更是天文数字。与获利所付出的媒体话语成本相比较,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正是西方国家不遗余力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敦促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利益动机。

(三) 从互文性维度分析西方话语的影响

Foucault 认为“没有一句话不在以某种方式再现其他话语”。^[7]所有话语都通过说话者的变换而与其他话语区分,他们只有通过过去说话者的话语和未来说话者预期的话语才能找到定位。因此,每个话语都是语言交流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语篇充满其他语篇的片段的特征。这些其他语篇的片段可能被明显地划分界限或融入该语篇中,可能被该语篇吸收、反驳、嘲讽地回应等。这个特征我们称之为“互文性”。西方各媒体正是运用话语的“构建的互文性”试图构建“人民币升值是市场必然规律”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者(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财长和总统)具有权威性或极大影响力的特点,因此在生产人民币升值话语以专家权威自居。他们利用大众传媒向经济社会中的人们转达了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学的“必然规律”,表达了这种权威性的预测。“人民币升值”、“贸易顺差”、“汇率操纵”、“市场化”、“经济规律”这些话语通过各种媒体向世界传播,使中国的决策者、中国的经济学家、中

国的普通百姓都深信人民币升值能让中国人得到更实惠的回报,这种观念随着不断重复成为了所有人的常识。这样一边倒的充满偏见的叙述,进入人们的思考方式,进一步强化让人民币升值的思维模式,甚至认同了这种意识形态,并热切盼望人民币迅速升值。西方话语正是这样逐渐构建了人民币必定要升值的思维定势。

四、映射函数模型的构建与展望

参照微观经济学的需求函数基本分析方法,构建了影响中国汇率决策的映射函数模型: $J=F(E, M, P, u)$ 。政府决策倾向度用 J 表示,西方话语影响中国决策的关键性自变量分为三类:政治压力用 P 代表,国际贸易上的经济压力用 E 表示,西方媒体的舆论压力用 M 表示,其他影响因素用 u 表示。通过分析 2010 年各时间段的西方国家督促人民币升值的各媒体话语与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相应时间段的人民币汇率波动数据可以得出:政府决策倾向度的值与国际贸易上的经济压力、西方媒体的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成正相关关系。其中,美国运用国际贸易上经济压力的效果最为显著。美国在 2010 年 3 月到 4 月间,以贸易逆差为据并威胁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让中国顾及外贸出口的前景(出口下降将导致 GDP 增速相对基准下跌,抑制国内消费,影响国内就业),从而迫使中国改变汇率政策,使人民币升值。迫于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压力,中国央行于 2010 年 6 月启动了“二次汇改”,人民

币从此进入加速升值通道。

本文构建了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决策的映射函数模型。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各媒体话语中被强调的和省略的是什么,究竟构成了人们的预设的是怎样一些模式和概念?这些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西方国家正在通过话语向中国植入“科学”观念,让中国决策者潜移默化地做出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利益的决策。映射函数模型各变量的影响系数有待更多学者对数据进一步研究。此研究为中国决策者进行媒体话语反干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GRIN F. 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language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96 (121): 1-16.
- [2] BARRY R. Immigrant earnings: Language skills, linguistic concentrations and the business cycle[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2 (15): 13-18.
- [3] DUSTMANN C. Language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2002: 473-492.
- [4] 鲁宾斯坦. 经济学和语言[M]. 钱勇, 周翼, 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15-38.
- [5] BRETON A.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language.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to bilingualism[M]. Ottawa: Canadian Heritage, 1998: 1-33.
- [6] 汪丁丁. 观念创新与符号交往的经济学[J]. *社会学研究*, 2001 (1): 26-37.
- [7]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2: 98.

On Western Discourses' Influences on Fluctu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DING Zhi-m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Hangzhou 311231,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an examination of western discourses' influences on fluctu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in 2010, this article, in perspectives of cost-benefits, psychology, inter-textuality and discourse's effect on reality,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hidden motiv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s' influences on Chinese exchange rate policy. Based on the analysis, it suggests a functional equation by revealing the key variables in the Chinese exchange rate policy.

Keywords: western countries' discourses; inter-textuality; exchange rate policy; RMB appreciation

(责任编辑 王 抒)